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Д.С. 米亚斯尼科夫 主编 徐昌翰 等译 徐昌翰 薛衍天 审校

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中）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Том 1
1803 * 1807

【俄】B. C. 米亚斯尼科夫 主编 徐昌翰 等译 徐昌翰 薛衍天 审校

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
第1卷 1803~180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Том 1
1803 * 1807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ББК 63.(5Кит.)
Р88

Данный том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при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Б. Давыдова, И.Т. Мороз, В.С. Мясников,
Н.Ю.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ка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том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Сборник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ервый том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се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 Дан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впервые делает доступный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омплекс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сольством Ю.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Цинскую империю (1803–1807). Публикуем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освещают вопросы подготовки посольства, поездку в Пекин 9-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сла на границе и в Урге.

Р 0503010000 - 020 Без объявления
01Д(03) - 95

ISBN 5-88451-029-2 Том 1
ISBN 5-88451-032-2

© Давыдова М.Б., Мороз И.Т., Мясников В.С.,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Н.Ю., составление, 1995

© Мороз И.Т.,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указатели, 1995

© Мясников В.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95

©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5

№ 179

1805 年 10 月 6 日。外务院驻恰克图特派员
A. И. 索科洛夫就通知买卖城扎拉固齐克西
克俄国使臣已抵达国境事呈使臣 Ю. А. 戈洛
夫金的报告

//143//外务院驻恰克图特派员、领边境事务七等文官
索科洛夫呈二等文官、枢密官、院部大臣、宫廷及俄罗斯各
骑士团总典礼官、特命全权使臣、赏戴勋章尤里·亚历山德
罗维奇·戈洛夫金伯爵大人阁下：

奉伯爵大人之命，为将大人于昨日抵达特罗伊茨科萨夫
斯克要塞的消息告知买卖城扎拉固齐，卑职已派属下十四等
文官马克西莫夫知会扎拉固齐，大人已于昨日下午 5 时抵达
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要塞。

扎拉固齐非常感谢卑职的通报，//143 背面//但没有打
听任何消息，只是询问大人是否会于出国之前拨冗至恰克图
哨所一行。对此马克西莫夫回说不知，遂即返回。

七等文官索科洛夫

1805 年 10 月 6 日

于恰克图哨所

143 页正文上方：1805 年 10 月 6 日收到。

同页页边空白处：№ 7。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 1—7，目
录 6，1805，案卷 1a，卷夹 24，143~143 页背面。原件。

No 180

1805 年，不早于 10 月 7 日^①。军机处给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福海的命令，传达嘉庆皇帝关于缩减 Ю. А. 戈洛夫金使团随从、在库伦提交呈送皇帝的贺表礼单、向使臣及随员传授叩头礼^[1]的谕旨

//143//9 月 8 日收到^②

军机大臣令行库伦办事大臣、喀尔喀郡王等^[2]

蕴等所呈奏折称：

俄国使臣来信颇为不敬^③，其中多有炫耀其显赫之辞，为执行前次由库伦给戈洛夫金送去的命令，着即去信以示拒绝^④。

俄人本性桀骜不驯，以往邀请其使臣之事本不多见。去年俄人多次请求遣使入 //312// 朝，辞色甚恭，故朕方颁谕准其所请。但此事绝非我方邀请。今彼等来信颇有不恭，且信中行文时将彼国汗谕旨置于朕谕旨文字之上。^[3]由来信得知来朝人数并未减少，信中亦未告知现时是否已备妥上奏皇

① 根据皇帝谕旨的时间（嘉庆十年八月二十七日）确定。

② 10 月 17 日。

③ 参见 159 号文件。

④ 参见 173 号文件。

帝之贺表，且不肯呈报贡品为何物，显系别有用心。其行何其卑鄙！桀骜蛮横如此，如何还能邀请！蕴等此次已去函告知//313//我方拒绝之意，并命彼方信使送交使臣，何其正确。如俄使收到我方拒绝后半途止步，倒也甚好。

如俄国所派使臣枢密官戈洛夫金伯爵而后依然来到库伦，蕴等宜以以下理由向其说明我方此前//314//缩减随员之理由。

我们说要你方缩减人员，全是出于我英明大皇帝体恤外国人，由库伦至北京路途遥远，且伊緬加扎色地区山峦纵横，山地行进极其困难。

无须再如以前对彼等说，我方不希望对方来人如此众多，须减缩使团随员等等。至于纳贡事宜，要详细询问贡品究为何物，向皇上呈献贡品时是否有贺表。如戈洛夫金行事恭谨，肯于缩减随员，向蕴端多尔济等呈递纳贡贺表礼单，则可对彼等说：尔等踏上天朝大国土地，朝觐皇上，按我国法规，凡欲朝拜我英明大皇帝必须遵守礼仪。言罢，即着彼等面朝东方，教以叩头之礼。如彼等一切中规中矩，心无动摇，面容虔敬，行叩头之礼，//315//可着蕴端多尔济等详细奏报，然后再依原旨按原定日期送使团〔由库伦〕入朝。如俄方有一项条件不能完成，立即予以坚拒，将其遣送回程。决不可优柔寡断！

前所呈国书可于阅读翻译后，由理藩院按规定拟出致枢密院回书，交蕴端多尔济等转送俄罗斯理藩院。

着即遵照执行，此令。

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藏档 M-1，案卷 639，311~315 页。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满文抄文簿抄件，И. Т. 莫罗兹译自满文。

注释：

[1] “叩头”，中文也叫“磕头”，是中国跪拜礼仪的称呼。中国人行这种礼有几个不同的方式或程度。“叩头”的大礼在朝拜皇帝时使用，由三次下跪和九次磕头组成。所有到中国的人，不仅要在面见皇帝时行此大礼，而且还要在进入宫门时、皇帝宝座之前（即使上面是空的）、宣读皇帝谕旨等场合也行此礼。

还有一种形式是两跪六叩首、一跪三叩首，以及它们的变异——屈膝三次，两手据地俯首九次 [见 М. И. 卡扎宁：《专案注解》，载伊杰斯·伊兹布兰特和亚当·勃兰特：《俄国使华使团札记（1692—1695）》，350～351 页]。叩头礼有时也在其他场合乃至在级别比较低的人面前举行。论述叩头礼的资料有许多 [如：Rockhill W. W. *Diplomatic audiences of the court of China*. (《中国宫廷的外交礼仪》)，伦敦，1905；A. C. 马丁诺夫、B. C. 米亚斯尼科夫：《清帝国和 17 世纪的俄罗斯国家》，载《亚非民族》1985 年 5 期，182～189 页；关于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皇帝为外国使臣规定的礼仪，参见 И. Я. 科罗斯托维茨：《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576～582 页]。

这一对于外国人来说具有屈辱性质的礼仪，从唐帝国建立起一直存在到 1858 年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同法、英、俄、美）止，产生于中华帝国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它不把自己的邻国看成同自己平等的国家。在清帝国时期这也是看待俄国的观点。

如果使臣拒绝行廷见礼，就不允许他朝见，并被赶出国家。这样他就无法完成交给他的外交使命。例如费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见 103 号文件注释 1）就因为事先没有得到己方国君的指令，又怕受到侮辱，拒绝行叩头礼，故而只好返回俄国，未能完成交办的外交使命。不过，正如 Н. Ф. 杰米多娃和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是出使失败的主要原因 [见 Н. Ф. 杰米多娃、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出使中国的首批俄国使者（佩特林的报告和巴伊科夫的奏章）》，93 页]。Ф. И. 巴伊科夫之后的所有俄国使臣（如斯帕法里、伊杰斯、伊兹玛伊洛夫、拉古津斯基）都行了完整的叩头礼（И. Я. 科罗斯托维茨：《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566～568 页）。荷兰和葡萄牙的使臣到中国来也行了叩头礼（И. Я. 科罗斯托维茨：《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565～566 页）。据英国使臣马嘎尔尼

(见 59 号文件注释 2) 说, 他拒绝行叩头礼, 只是单腿下跪, 吻了弘历皇帝的手。因而出使的任务完成得也不顺利: 他在给皇帝的信中提了很多要求, 一条也没有被接受 (《中国近代史》, 54~55 页)。

现在不是在北京廷见时, 而是在库伦排开的香案 (博格德汗圣驾的象征) 面前就要演练这样的礼节, Ю. А. 戈洛夫金使臣当然不愿意, 这就成了天朝帝国拒绝在京接见俄罗斯使团的正式理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谈判的过程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叙述事件经过时, 我们不应忽略一个事实, 就是在 Ю. А. 戈洛夫金使团抵达中国很早之前, 荷兰伊萨克·迪清使团 (1795) 的顾问王·勃拉姆就曾于广州在皇帝的牌位前详细演示过廷见礼。据 И. 科罗斯托维茨说, 这个使团的成员对于下跪之类的事并不太在意, 他们随意跪拜, 所以“有理由猜测, 荷兰人过于巴结的行为在清帝国政府的眼中败坏了欧洲人的威望, 也促使了 1805 年戈洛夫金伯爵使团难以获得成功” (И. Я. 科罗斯托维茨: 《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 572 页)。

还是回到 Ю. А. 戈洛夫金使团。我们应该记得, 关于礼仪问题, 在亚历山大一世给出使清帝国使臣的训令中, 占有整整一条。其中说: “虽然北京宫廷在接见和对待其他国家来访的代表时要求严格遵守他们自古以来一直要求博格德汗的臣民遵守的礼仪规范, 但此前由我国派往彼处的各类官员却都能够设法免除礼仪中某些有损于俄罗斯帝国尊严的成分。我们希望你也能够尽可能地发挥你的杰出才能, 维护我帝国的尊严, 为此在你进入北京和中国皇帝留驻的其他地方时, 应同他的大臣商定你们受到接见的方式和你们应遵守的礼仪, 但此时以及在其他场合都不应由于礼仪——如果中国人狂热地坚持这种原始的礼仪的话——而牺牲我们派你们此次出使北京所希望获得的利益” (见 130 号文件)。Ю. А. 戈洛夫金正是以这一条指示来指导自己同库伦办事大臣的谈判中关于在库伦行叩头礼的问题的。

首先提出要求俄罗斯使臣学习叩头礼并要求他在库伦行此廷见礼的是嘉庆皇帝 (1805 年, 不早于 10 月 7 日), 库伦办事大臣接到他的谕旨是 10 月 17 日。这时俄罗斯使臣已经到达边境, 正在恰克图。而且 (这一点应特别予以注意) 按照谕旨, 在库伦学习和演习叩头礼的要求不能向使臣立刻提出来, 而是先要坚持缩减使团人数, 坚持提交“贡品”清单以及给博格德汗纳贡的贺表。只有在此之后, 库伦办事大臣才允许向使臣通报, 说是在面见至圣大皇帝的时候, 清帝国存在着这么一种“法定的礼节”。然

后再强迫 Ю. А. 戈洛夫金学习和演练。同时皇帝在谕旨中还提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使臣在行此礼时要“心无动摇，面容虔敬”。只有在完成了谕旨中所有要求后，博格德汗才允许使团下一步由库伦进入天朝大国的首都。否则嘉庆皇帝就要下令把它遣送回俄罗斯（见 180 号文件）。

库伦收到这道谕旨后，事情的进展就成了这个样子：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福海严格遵照皇帝的谕令，于 1805 年 10 月 13 日给 Ю. А. 戈洛夫金写了一封信，坚持要求缩减使团人数，但却把收到皇帝命令要求使臣在库伦演习廷见礼的事隐瞒了下来（见 187 号文件）。他们也没有通过这时送信来到库伦的信使桑热哈耶夫传达任何有关消息（见 188 号文件）。

首次同俄方代表商谈廷见礼（一般性的商谈）是同使团一秘 Л. С. 巴伊科夫进行的，Ю. А. 戈洛夫金派他到库伦去是谈判缩减随员的问题（见 201 号文件）。巴伊科夫于 1805 年 10 月 23 日到达库伦，但在会见郡王与昂邦之前，有几个清方官员奉命事先跟他交谈，他们告诉他，说是应该就礼仪达成一致，并把出使证书的内容告知。就此巴伊科夫回答说：“至于说到要在国境就谈妥礼仪的问题以及正式通知出使证书的内容，这样的要求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合法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确定的规则，它们是不能破坏的。”此后 Л. С. 巴伊科夫得到郡王与昂邦两次接见。第一次（10 月 25 日）他们向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戈洛夫金伯爵是否知道我们的规矩？最重要的是他是否知道在朝见皇帝时有匍匐跪拜的习惯，他是否能遵守这样的礼仪？”对此巴伊科夫回答说：“关于礼仪的一切问题不应该在国境上谈。”后来关于行礼的问题双方代表就再没有提起过。10 月 27 日巴伊科夫打道回程。（见 202 号文件）

这时嘉庆皇帝又颁发了一道新旨（1805 年，不早于 10 月 28 日），郡王与昂邦于 11 月 6 日收到。在这道旨意中他再次命令在库伦教导使臣学习廷见礼。不过为了让这一“新举”得以顺利进行，博格德汗命令如果 Ю. А. 戈洛夫金演习了廷见礼仪，可以为他举办庆功宴会（见 204 号文件）。这一旨意在 11 月 13 日送达库伦的下一道上谕中又重复了一次（见 208 号文件）。

这样，一方面库伦办事大臣只能毫不走样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在库伦演习廷见礼；另一方面他们在同 Л. С. 巴伊科夫谈话中已经知道了俄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郡王与昂邦开始不是直接活动，而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在接到皇帝旨意的第二天蕴端多尔济和福海给俄国使臣去了一封信，

要求对方以书面形式确认使团一秘的话，在朝见博格德汗时 Ю. А. 戈洛夫金将行廷见礼（见 210 号文件）。在《库伦逗留期间日志》中（见 202 号文件）并没有记载，说 Л. С. 巴伊科夫对库伦办事大臣作过这样的许诺。不过 Ю. А. 戈洛夫金还是同意了库伦的这一新要求：“至于我面见博格德汗时的礼仪问题，我知道先我而来的人都遵守了什么样的礼仪，我无疑也会学他们……”（见 213 号文件）可见，这一次谈的也不是在库伦演练叩头礼的问题。郡王与昂邦对这封信没有给予回答。

然后，还在使团离开恰克图之前，一个买卖城的扎拉固齐奉郡王与昂邦的指令到了那里（1805 年 12 月 12 日），向 Ю. А. 戈洛夫金宣称皇帝有谕旨（见 218 号文件）同意使团进京。从种种情况来看，扎拉固齐也是奉命来打听俄国使臣对行廷见礼的态度的。这种猜测是以扎拉固齐的行为为依据的。因为他先是见了 Л. С. 巴伊科夫，通知说：“当他向俄国使臣宣布博格德汗陛下的谕旨时，使臣大人为了表示对皇帝陛下的崇高敬意，应该起立恭听宣读，而且按照他们的习惯宣读这样的谕旨时是要跪着听的。但他可以同意使臣站着听宣读。”巴伊科夫对此回答说，使臣“一定会非常高兴有机会面见博格德汗……但特命全权使臣的地位要求他在接见别人时只能坐着，不能采用别的姿势。”扎拉固齐在会见使臣时又提出了这一要求，但再次遭到拒绝（见 212 号文件）。这次谈话的内容当然立刻报到了库伦。

Ю. А. 戈洛夫金踏上清帝国国土后，（从塔希尔驿站）给库伦的蕴端多尔济和福海送去了一封报告使团行程的信，并派使团一秘 Л. С. 巴伊科夫为信使，命他商谈第一次见面的事（见 212、244 号文件）。库伦送来了令人宽慰和充满希望的回答，但一字不提演练廷见礼的事，也没有提到为使臣设庆功宴的事（见 244 号文件）。这样，一直到库伦，俄国使臣也是对他要在边境城市演练廷见叩头礼的事毫不知情。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到了库伦也不是立刻就开始的。

在 Ю. А. 戈洛夫金使臣和使团一秘巴伊科夫同库伦办事大臣谈判的记录中可以看到，Л. С. 巴伊科夫到达库伦的时间比戈洛夫金要早，他同郡王与昂邦有过三次“商讨”，但关于礼仪的问题在会见中并没有提起。到达库伦后，俄国使臣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郡王与昂邦。可是在这次拜访和库伦办事大臣对 Ю. А. 戈洛夫金的回访中，关于礼仪的事还是没有提起。郡王与昂邦只是告诉他，博格德汗“命令为他庆功”。1806 年 1 月 4 日，他

们派来了秘书托克托布，在同 JI. C. 巴伊科夫谈话时就庆功宴的问题说，“使臣一定要对博格德汗格外施恩表示感谢”。使团一秘对此回答说，为了感谢皇帝的恩典，使臣在“赐宴开始时将举杯起立，祝皇帝陛下健康长寿，说这样的礼节在我国大皇帝面前也是如此行事的”。对于这些话托克托布并没有表示反对。当 IO. A. 戈洛夫金面见郡王与昂邦时，他们在设宴款待他之前要求他“在朝南摆放的香案前铺设的三个红呢拜垫上行三跪九叩首礼”。使臣回答说他事先没有接到通知，于是拒绝行这样的礼（见 212 号文件）。

库伦发生的事以及后来库伦办事大臣们在奏折中所叙述的实际上同谈判记录相符。郡王与昂邦在奏折（1806 年 1 月 13 日）中报告，1 月 3 日他们同俄国使臣有两次会见，第二次会见时告诉他，第二天皇帝要为 IO. A. 戈洛夫金赐宴。4 日一早，库伦办事大臣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这样做：当赐宴准备停当后，就向戈洛夫金解释，中华帝国“为了向皇上谢恩，有一种匍匐跪拜的礼节”。然后要求俄国使臣跟他们一起完成这种礼节。据奏章中说，为了把这件事说明白，还派秘书托克托布去了俄国人的营房。可是交给他的这项任务，说得不好听，有点奇怪——郡王与昂邦交代托克托布（据奏章中说）“谈话时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向俄国人宣布，要给他们赐宴。托克托布回来报告说，“他通过翻译把什么都对俄国人说明白了”（见 252 号文件）。

这样一来，根据满文文件也可以看出，当戈洛夫金到郡王与昂邦那里赴宴的时候，要求他在筵席开始前跟他们一起（对着靠东墙摆放的香案）行廷见大礼也是一件绝对突然的事。有意思的是库伦办事大臣坚持要在库伦教 IO. A. 戈洛夫金演练廷见大礼，不仅是要对赐予俄国人的恩典（博格德汗赐宴）表示感谢，而且还因为据说俄国使臣在信中已经答应到北京廷见时行叩头礼，那么为什么在库伦就不能行这个礼呢。IO. A. 戈洛夫金在回答时再次重复，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正如他信中写的那样，叩头礼他要到清国皇帝接见时才能行。

双方争论不休，就出现的“误会”交换书信。库伦的郡王与昂邦埋怨托克托布把“跪拜”这个词说得不清不楚，可是却向他们报告说是说得明明白白。郡王还又向使臣道歉说，会见时“忘记了通知他行礼这件事”。又说翻译符拉德金搞错了，符拉德金却肯定地说托克托布所说的一切他都翻译得准确无误。明确这些关系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俄国使臣 IO. A. 戈

洛夫金坚决拒绝在边境城市演练叩头礼，他宣称自己的行动只能以“给他颁发的旨意为根据”，他将“按旧例行事”（见 212 号文件）。

库伦办事大臣害怕进京后会出现麻烦（要是到了那里 Ю. А. 戈洛夫金忽然拒绝行廷见礼呢），在前引的奏折中请求下诏“把俄国使臣赶回恰克图”（见 252 号文件）。皇帝下诏，如果俄国使团在库伦不行叩头礼，就把他们遣送回去（1806 年，不早于 1 月 21 日）。库伦办事大臣接到这道圣旨的时间是 1806 年 1 月 29 日（见 263 号文件）。不久，戈洛夫金使团回国。

[2] 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着理藩院于 9 月 23 日（1805 年 10 月 23 日）给库伦办事大臣指示的蒙古文本译文验明无误的抄件，附有嘉庆皇帝关于接待俄国使团礼仪的谕旨：

//366//扎拉固齐书办由满文原文翻译成蒙古文的文件，由百人长纳济莫夫从蒙古文翻译成俄文。

总领外蒙古各省衙门致库伦章京于留久姆日等人：奉大博格多额真汗（原文有下加线。——俄编者）给本衙门谕旨，特告知尔等：

1. 尔等应于官员中遴选行为端正、办事干练者一人，立即派往恰克图迎接来我国之俄罗斯使臣，命其于见到该使臣时，首先询问他携带何物来朝见我博格多额真汗，携带何种礼品，有何要求，随行官员几何，普通人员几何，行李辎重几何，状况如何，着前往恰克图的扎拉固齐通过自己手下从俄罗斯普通百姓处对一切详加了解，并将打听到的情况报告尔等，急速报与本衙门知道。

2. 与此同时还要派人到库伦的四邻各穆扎（页边有注解：满文的“省”。——俄编者），要他们从当地居民身上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收取钱税和各种牲畜，但却不要对人民造成过重负担，征集到牲畜之后，将其变卖，到各//366 背面//地采购食品，将之保存，等待使臣抵达库伦。

3. 使臣携带辎重抵达后，须将其用蒙古马和骆驼恭敬隆重地送往库伦，沿途食用须供给充足，勿使俄国使臣感到有所不便。

4. 俄国使臣到达库伦后，请其于当地逗留三昼夜，小事休憩，与此同时对之详加开导。因其不熟悉中国礼仪法度，不熟悉到北京后应如何去见博格多额真汗，所以才要在库伦对他加以开导，并尽量说服他满足博格多额真汗的要求。如其冥顽不化，可向本衙门报告。如果他能顺利地表示同意，可以博格多额真汗的名义留他在库伦大宴三日，尽情欢乐，暗示所

有一切安排都是按照我博格德汗的旨意，使臣的所有食品均专门由北京送来，这里为俄罗斯使臣的安排一切均比照京城的接待规格。

以后的护送事宜由张家口知府庄强永（音译。——中译者）负责。

9月。

正文下方：译文经八等文官彼得·伊兹玛伊洛夫核验（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案卷1a，卷夹27，366～366页背面，蒙古文翻译件的经核对过的文本抄件；另一经戈洛夫金核验过的抄件藏于同处，420～421页）。

[3] 按照清帝国严格遵守的礼仪规定，凡有涉及皇帝本人的字样（如“圣明皇帝”、“皇帝恩典”、“圣谕”等等），或者是提到国家名称的字样（如“中国”、“天朝帝国”），均应另起一行，顶格书写（满文是由上而下书写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这一规定不仅在公文中要遵守，在私家书信中也要遵守。

过去清国官吏也曾对遵守这项规定的问题提出过要求。例如1692年以埃维尔特·伊兹布兰特·伊杰斯为首的使团曾被派到北京。虽然俄国使臣两次受到皇帝接见，清政府却以沙皇国书中博格德汗的头衔写得低于俄国沙皇的头衔为借口，把沙皇国书和礼品退还给伊杰斯（《中国近代史》，60页）。不过Ю. А. 戈洛夫金的看法是：从来都是“各方均以大写字母书写己方国君的头衔。也就是说，北京政府这次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毫无通融的余地……”（见351号文件）

关于Ю. А. 戈洛夫金使团时期俄方文件中书写清国皇帝头衔出现错误的问题可参见翻译帕雷舍夫呈西伯利亚总督И. О. 谢利丰托夫的报告（见211号文件）以及满文翻译А. Г. 符拉德金呈Ю. А. 戈洛夫金的报告（见414号文件）。

No 181

1805 年 10 月 8 日。Ю. А. 戈洛夫金就提交
 随行人员缩减后官员和随员名单以及运送使
 团行李所需兽力运输工具等事致库伦办事大
 臣蕴端多尔济、福海的信

//105//1805 年 10 月 8 日使臣戈洛夫金伯爵致库伦办事
 大臣郡王、昂邦函

郡王和昂邦大人，当我到达国境时，我有责任通知你们：按条约第九款规定，一国如因公向另一国派遣大小使节，当该使节抵达国境时，应将己方事体内容知会，在国境少事等待，俟对方派人迎接，并予以//105 背面//护送，为其提供快车伙食，悉心照料，到达一地后要提供住地膳食等等^[1]。因此特告知你们，我已奉我至仁皇帝陛下之命出任谒见博格德汗陛下的特命全权大臣，向博格德汗陛下呈递国书，禀告我皇帝//106//陛下已在万众欢庆中继登祖父大宝，同时也向博格德汗陛下祝贺顺利继承皇位，表示我全俄罗斯至仁皇帝陛下衷心希望全力巩固和扩大双方国家至为愉快和顺利发展之和谐友谊，献上//106 背面//礼品，以表达我皇帝陛下对博格德汗陛下之友好情谊。

我能为实现此项崇高意愿聊尽绵薄，引以为巨大光荣，定将为推进和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有益之举鞠躬尽瘁。

蒙郡王和昂邦大人最近来信赐告，博格德汗陛下//107//恩德无量，“有如天高地厚；奉其恩旨，为体念路途

遥远，气候恶劣，特命减少随从，剔除冗员”。今敬告郡王和昂邦大人，能够遵从博格德汗陛下的旨意，我感到无上荣幸，现已着手削减随员，相信我全俄罗斯仁慈的皇帝陛下会允许我未经请示采取此项行动，并视我为//107 背面//满足博格德汗陛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为善举。根据给我的指令，我已为留在我身边的官员分配了职司，确定了人数，并有名单附后。希望郡王和昂邦大人从我的举动中能看出我的诚意和努力，不致辜负贵国大国君的仁慈和恩典。我为能尽这样的义务而感到高兴。

至于郡王和昂邦大人要求的礼品清单//108//一事，我应该告诉各位，在各种有资格向博格德汗陛下献上的极为贵重珍稀的礼品中，有多面大镜子和其他珍稀物品，但其特点是经过长途搬运极易损毁，故于顺利将它们运抵目的地之前我无法按照贵方要求提交准确清单。

此外，//108 背面//条例中未见提及，过去使团亦从无先例，要求俄罗斯使臣必须于朝见博格德汗陛下之前呈报此类清单。

至于驼、马和辎重数量等，目前还不能呈报给郡王和昂邦大人，因为第一，目前仅仅是刚刚把行李和我带来的礼物合到一起；第二，//109//我国都是用大箱子运输物品，而过国境后，为了便于运输，将全部改装为小箱子。

查点我随行的行李物品后，现在我可以准确地告诉郡王和昂邦大人，需要的驼马见附件清单^①。此外，按大人//109 背面//于8月29日信中^②所示，我方将自备坐骑，沿途尚需各驿站供应一定数量饲料。

① 见 183 号文件。

② 见 109 号文件。

最后我想愉快而荣幸地通知您，郡王和昂邦大人，我最重要的责任和努力的目标，就是不仅要保持，而且要努力加强已经顺利地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和谐与友谊，以证实两国之间所有//110//关系都牢不可破。

专此奉达。签字盖章。

1805年10月8日于恰克图

正文下方：戈洛夫金伯爵

110页背面：在戈洛夫金伯爵的报告中为附件5^①。1805年11月23日收到。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目录6，1805年，案卷1a，卷夹25，105～110页。经核验的抄件。草稿存同处3～4页背面、7～7页背面、9～9页背面。满文翻译为A. Γ. 符拉德金，译稿存同处10～14页背面。蒙文翻译为Φ. 桑热哈耶夫，译稿存同处15～17页。

俄文稿抄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俄关系史俄文文件藏档案卷11，39～46页。

使团办公厅抄文簿抄件：俄文本存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目录6，1805年，案卷1—2，卷夹26，143页背面～147页背面；同处，卷夹28，50～53页；同处，亚洲司图书馆全宗，目录505，1806年，案卷32，10～12页背面，满文本存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目录6，1805年，案卷1a，卷夹28，53～56页背面；蒙文本存同处，57～60页。

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抄文簿抄件：满文抄件存蒙古国立中央

^① 见189号文件

历史档案馆，藏档 M-1，案卷 639，268～274 页^①；蒙文抄件藏于同处，276～283 页。

发表于《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俄国外交政策》，卷 2，609～611 页。根据底稿印出。

注释：

[1] Ю. А. 戈洛夫金引用的是 1727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第 9 款（见《1689—1916 年的俄中关系：官方文件》，21 页）。

^① 268 页上有：九月二日，即 10 月 12 日收到。